

論《詩經疾書》的學術文獻價值*

白 承 錫**

<目次>

- | | |
|----------------|---------------|
| I. 前 言 | 3. 視野開闊, 全面深入 |
| II. 李灝和《諸經疾書》 | 4. 博創致用, 妙契清儒 |
| III. 《詩經疾書》價值考 | 5. 比較研究, 別開一境 |
| 1. 大膽懷疑, 認真探究 | 6. 謙虛好學, 不恥下問 |
| 2. 遠紹漢宋, 近承新風 | IV. 結 語 |

I. 前 言

《詩經》從西周至春秋時代“詩三百”萌生，到孔子·荀子·孟子的整理和漢代鄭玄等人的注解·詮釋的過程，終於由民間歌謠·宮廷樂歌而成爲儒家的經典。其後的《詩經》研究不脫離儒家的範疇，相互踏襲之，如唐代孔穎達·宋代朱熹等。到了清代盛行考據之學，開始懷疑古代《詩經》研究的成果，嘗試着走出“尊毛”(《毛詩序》)和“尊朱”(朱熹《詩集傳》)的藩籬，開創新的·實證的·科學的研究和闡釋之方法。作爲中國之近隣和漢字文化圈的朝鮮王朝，也受到了清代學術思潮的影響，一代學者也漸漸地試圖運用新的治學方法和理念，重新審視·解說儒家經典，雖說尚不成熟，但也涌現不少令人矚目的學術成果。其中，尤其是李灝成爲新思潮的先鋒，結合異域風情和獨到的治學特點，多

* 本論文 2011年 10月 8日 在中國南京大學文學院舉辦“第二屆漢學與東亞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的文章修改而成。

** 東國大學校 中語中文學科 教授

方面研究·闡釋儒家經典，並且努力擺脫蒙蔽全朝鮮學界的陳規舊習，一舉成爲碩果累累，影響深遠的漢學大師。在此，通過他的《詩經疾書》，探討其重要的學術文獻價值和貢獻。

II. 李瀾和《諸經疾書》

《詩經疾書》是李瀾(1682~1763)所作的《諸經疾書》之一(其他有《孟子疾書》·《大學疾書》·《小學疾書》·《論語疾書》·《中庸疾書》·《家禮疾書》·《近思錄疾書》·《心經疾書》·《易經疾書》·《書經疾書》等)。李瀾出身於朝鮮王朝沒落的兩班貴族家庭，他的父親李夏鎮，曾任司憲府的大司憲，並於康熙十七年出使北京，家藏數千卷漢文典籍。李瀾自幼聰慧，好學嗜道，但由於其父親在朝廷黨爭中遭到貶逐，家道中落；隨後其兄也上書忤旨，遭到杖殺，於是絕意仕路，隱居星湖莊，潛心作學問，世稱星湖先生。他博覽群書，自經·史·子·集，至天文·地理·律算·陰陽·醫藥，無不涉獵，成爲朝鮮一代學術大師。

李瀾所處的時代，正是朝鮮社會大動蕩·大變化的時代。由於壬辰倭亂和丙子胡亂的兩次戰亂，國家經濟凋弊，民衆生活困苦，朝廷內部也朋黨爭鬪不斷。而自高句麗·新羅·百濟三國時期就傳入¹⁾，並成爲朝鮮王朝國家絕對統治理念的儒家思想，也面臨着西洋文明的衝擊和清朝新學風的影響，高麗末葉所盛行的以程朱理學爲主的儒家學說，開始受到懷疑和批判。李瀾接受了當時反對空談性理·主張“經世致用”的新思潮——實學思想²⁾，認識到研究學

1) 高句麗(B.C.37~A.D.668)和新羅(B.C.57~A.D.935)各設立“太學”和“國學”等教育機關，且以儒家經典教育子弟。百濟(B.C.18~A.D.660)亦西元二八五年派遣王仁，將《論語》和《千字文》等傳授給日本。可見儒家思想當時已普遍。

2) 18世紀以後朝鮮後期興起的一種學風，思潮。以反對當時學術界之弊端，反省之。大概分爲三個學派：18世紀前半，以李瀾爲中心的“經世致用”學派；18世紀後半，以朴趾源爲中心的“利用厚生”學派；19世紀前半，以金正喜爲中心的“實事求是”學派。參見於《實學研究入門》，서울：一潮閣，1973年，頁6。

問不能脫離社會·政治的需要，要把握“經世致用”·“利民厚生”的原則。正是在這種社會思潮的背景下，李瀛試圖對儒家的基本經典作全面性的新解釋，這就是他的代表著作《諸經疾書》。

所謂“疾書”，本出於朱熹〈張橫渠畫像贊〉一文：“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這篇本來是朱熹贊詠張橫渠力學精思之功的。宋熊剛大曾經在“妙契疾書”之下，註解云：“中夜妙合于此心，取燭速記其所得。”³⁾是說明有所心得，緊快記錄下來。李瀛自己亦在《孟子疾書·序》中作了進一步闡述：“疾書者何？思起便書，蓋恐其旋忘也。不熟則忘，忘則思不復起，是以熟之爲貴，疾書其次也。”⁴⁾由此可得知，“疾書”就是平常閱讀經典時，如有疑問或個人體會，爲了不忘記而趕緊寫下來，相當於中國的“讀書雜記”或“隨感錄”。若追根溯源，這實際上是孔子所說的“學而時習之”，以及宋儒王應麟的“困而學之”的繼承和發揮。由於《諸經疾書》全用規範的漢文文言撰寫，流傳本以筆寫楷書爲主，中間插有部分小字行書；所引用的圖書資料也大多是明清之前傳入韓國的中文典籍，包括一些極爲珍貴的古代版本，對於今人來說，具有相當豐富·重要的學術文獻價值。例如，李瀛引用中國古書多達五十餘種，細目如下：

《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詩經》·《書經》·《周易》·《尚書大全》·《孝經》·《大戴禮記》·《禮記》·《易林》·《周禮》·《爾雅》·《儀禮》·《家禮》·《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呂覽》·《國語》·《戰國策》·《漢書》·《晉史》·《通鑑綱目》·《管子》·《荀子》·《莊子》·《韓非子》·《淮南子》·《孫子》·《孔子家語》·《朱子語類》·《說苑》·《馬經》·《本草綱目》·《韓詩外傳》·《天文誌》(《甘石星經》)·《法言》·《小學》·《文獻通考》·《新序》·《說文解字》·《事文類聚》(《古今事文類聚》)·《楚辭》·《竹書紀年》·《農政全書》·《釋名》·《升菴集》。

3) 見於宋熊節編的《性理羣書句解》卷一。載於《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子部15，v709，頁96。

4) 李瀛，《星湖全書》，서울：驪江出版社，1984年，卷四，頁491。

由此可見，李瀾的《疾書》雖是記下思辨省察過程中的感想，但用功甚勤，一字一字細察字書確認字義，並未忽略龐雜·繁富·翔備的資料考證，而且廣泛引用各種典籍作立論依據。這對於儒家經典的流行·推廣，具有重要的意義。李瀾《疾書》各種底本，現分藏如下：

- 《書經疾書》 栖碧外史 海外搜佚本 一冊(原本是日本東洋文庫所藏本)
- 《易經疾書》 國立首爾大學 奎章閣本 二冊
- 《論語疾書》 國立中央圖書館本 二冊
- 《孟子疾書》 國立中央圖書館本 三冊
- 《中庸疾書》 國立中央圖書館本 一冊
- 《大學疾書》 國立首爾大學 奎章閣本 一冊
- 《家禮疾書》 國立首爾大學 奎章閣本 二冊
- 《近思錄疾書》 國立首爾大學 奎章閣本 一冊
- 《心經疾書》 國立中央圖書館本 一冊
- 《小學疾書》 國立中央圖書館本 一冊
- 《詩經疾書》 國立中央圖書館本 三冊

他就從《孟子》開始，接着按《大學》·《小學》·《論語》·《中庸》·《家禮》·《近思錄》·《心經》·《易經》·《書經》·《詩經》的順次，著成系統的《諸經疾書》。這些《疾書》中，《詩經疾書》的「小雅」部分是本來殘缺，但後來發掘國立中央圖書館的珍藏本，可幸補充之，成爲一個整本的。⁵⁾ 李瀾這些著述及其他一些存世的文集，作爲韓國重要的文學遺產，於1984年由漢學者李佑成蒐集整理成《星湖全書》七冊，在韓國驪江出版社出版發行。《諸經疾書》的學術成果是多方面的，我們不妨從《詩經疾書》入手，作一些剖析和討論，以期拋磚引玉。

5) 參見《星湖全書·序》，《星湖全書》李佑成解題，頁6。

III. 《詩經疾書》價值考

下面,以《詩經疾書》為例本,從六個方面,具體探討一下該書的學術文獻價值所在。

1. 大膽懷疑,認真探究

這是《詩經疾書》的基本治學態度和治學精神。當時之世,學者一般盲信盲從程朱的性理學風,奉《詩集傳》為圭臬,李灝則不以為然,敢於提出懷疑和辯駁。由於他有深厚的漢學傳統和基礎,所以能在申說已說時又能廣泛列陳材料,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例如,關於“六義”的問題,李灝在〈周南·關雎〉的《疾書》中云:

六義之說,出於《周禮》。經緯之論,自朱子始。若然,《周禮》何故先風,次賦·比·興,次雅·頌,與經緯不合乎?……愚嘗妄有所論,凡詩之用,有六義也。風者,風動下民,如草尚之風是也。賦者,誦言而導達,如享宴賦詩是也。比者,托物而曉人,如諷諫是也。興者,興起善心,如興於詩是也。雅者,正言其事,如好善惡惡是也。頌者,下之贊上,如美盛德之形容是也。此周公之意也。……然六者,皆以用,不以體。⁶⁾

李灝先從《周禮》的“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與朱熹的《朱子語類》中“三經”(風·雅·頌)·“三緯”(賦·比·興)之說次序不合提出疑問,⁷⁾接著對“六義”作出自己全新的解釋,最後得出結論:“然六者,皆以用,不以體”,體現李灝治詩注重社會教化和政治功用的原則。以

6) 白承錫校註,《詩經疾書校註》,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3。

7) “或問詩六義,注‘三經三緯’之說。曰:三經是賦·比·興,是做詩底骨子,無詩不有,才無,則不成詩。蓋不是賦,便是比;不是比,便是興。如風雅頌却是裏面橫串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之三緯。”見於《朱子語類》卷80(第6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2070。

此出發，李漢對朱熹的“淫詩”之說亦多質疑，如李漢〈鄭風·遵大路〉中主張云：

按《集傳》自〈遵大路〉以下，莫非淫醜之語，惟〈女曰鷄鳴〉一篇為賢夫婦之作。何故此一篇，獨間於其間？其序列之義，恐不如是。朱子雖以宋玉賦為證，然孔子嘗引〈野有蔓草〉為邂逅賢者之證，此又何也？且鄭六卿饒韓宣子，〈褰裳〉·〈風雨〉·〈同車〉·〈蘼兮〉之類，皆在賦詩之中而不聞有譏何也？……此篇疑亦是直道見黜者，托女為喻也。其曰〈遵大路〉者，所行光明無愧，如〈羔裘〉之洵直也。意者二篇即一人事。既有〈羔裘〉之忠，而非罪棄廢，故以大路自況而訴其衷也。如屈原·賈誼之徒，始信際遇之盛，秉直盡忠，卒被放逐，其此之謂歟！⁸⁾

李漢從他的“實學思想”出發，先以作品篇次序列的不連續性來懷疑，又以孔子的言論為證，否定“淫詩”之說，最後主張由男女親疎比喻到君臣之關係，好比屈原·賈誼的前後之處境。又如〈鄭風·有女同車〉中《疾書》云：

此以下，惟〈出其東門〉一篇之外，《集傳》皆謂淫奔之詩。然“珮玉瓊琚”，非倡冶遊女之飾。而孟姜，貴族也；德音，善言也，義亦不着。〈丰〉之“褻衣”，分明是惡其文著，彼艷妝麗服，寧有尙褻之心？又況〈野有蔓草〉，聖人嘗引以自況，君子口吻，此可忍耶？以此推之，鄭六卿所賦，亦皆非淫褻之詞也。凡詩或悅或怨，而每多君臣之際，託諷之詞也。此篇即君悅臣之作。當時鄭亦多賢，如子皮·子產之屬。此恐是君得賢佐，却以男女託言者也。如二雅亦多天子答臣民之詩，何以異例？⁹⁾

這裏，李漢用社會·政治道德的角度來釋詩，或許受《詩序》“微言大義”的影響，難免有牽強附會之處。但他不囿陳說，不迷信權威，力求對《詩經》的社會效益和文化價值作出全面深入的認識，其探求精神還是難能可貴並給人啟發的。

8) 《詩經疾書校註》，頁130。

9) 《詩經疾書校註》，頁133。

2. 遠紹漢宋，近承新風

遠紹承漢代詩經學，又採納唐宋詩學成果，更受到清代新學潮的影響，這是《詩經疾書》的獨創一格之處。他治詩並不對全篇作繁瑣·冗長·空疎的注釋或考訂，而是抓住詩中的重點·難點·爭疑點，有選擇地申述自己的見解，突出思辨省察的光彩。例如〈召南·鵲巢〉的“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句，朱熹注云：“鵲·鳩，皆鳥名。鵲善爲巢，其巢最爲完固。鳩性拙不能爲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詩集傳》）此說幾乎成爲定論。但是李瀛不以爲然，認爲：“鵲巢鳩居未可曉，鵲無與鳩同居之理。鵲去而鳩居，義尤無當。”何以見得呢？他依據中國的古籍，作了一番獨辟蹊徑的考證：

按《書》注：鳩，聚也。聚者，群類也，恐是群類同居也。以字義求之，〈兔置〉云“好仇”，仇者，逌之本字。字從九，九者，糾也，故糾合亦作九合也。九而從人爲仇，則九而從鳥非鳩乎？然則鳩者，乃鵲之好仇，與〈關雎〉之好逌恰同。惟鳩居之者，維與仇同居也。¹⁰⁾

懷疑歷來的注解，查詢字義，層層推理，有理有據，亦與詩中婚嫁的主題相吻合，讀之令人耳目一新。又如〈周頌·振鷺〉，朱熹注云：“客謂二王之後。夏之後杞，殷之後宋，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者也。”（《詩集傳》）李瀛依據《左傳》，認爲客爲宋而已，“集注‘於周爲客’以下，《左傳》僖二十四年文。此指宋也。”接着依據襄公二十五年條，提起杞和宋以外，陳亦參加：“又按襄二十五年，武王封舜後於陳，以備三恪。則助祭之禮，陳必與焉。此獨言二王之後來，未知何義。〈有客〉云‘亦白其馬’。殷尙白，故惟宋爲然也。”¹¹⁾ 李瀛批評朱熹忽略《左傳》的記載，從“二王之後”的舊說。再如〈衛風·芄蘭〉，朱熹注云：“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詩集傳》）李瀛則依據《詩序》“刺惠公驕而無禮”和鄭箋“惠公以幼童即位，自謂有才能而驕慢

10) 《詩經疾書校註》，頁21。

11) 《詩經疾書校註》，頁483。

於大臣，但習威儀，不知爲政以禮。”作了更深入詳盡的論證：

按《左傳》魯隱公四年冬，衛宣公即位，爲伋子娶於齊，乃即位以後事，生壽及朔，朔即惠公也。假令以隱公五年而娶齊，至桓十二年惠公立，則其間十九年，惠公尙有母兄壽，則惠公之年，多不過十五·六矣。其說似亦有考。¹²⁾

李瀛對春秋的史實相當熟悉，其論證推也相當嚴謹細致，頗有說服力。

3. 視野開闊，全面深入

對《詩經》“頌詩”的獻疑和探求精神，又體現了《詩經疾書》研究視野的開闊·深入和全面。長期以來，《詩經》研究中重“風”“雅”而輕“頌”詩，即使是朱子的《詩集傳序》，也強調“里巷歌謠之作”，而在中國大陸奉行“階級觀念”的意識形態，認爲“頌詩”爲奴隸主貴族歌功頌德之作¹³⁾可以說是研究《詩經》的一個薄弱環節。李瀛在《詩經疾書》中，卻在這一方面下了一番功夫，對“頌”詩的思考和詮釋獨樹一幟，頗多真知灼見。探討“頌”詩之時，亦有值得參考之處。比如《周頌》開篇《清廟》，《荀子·禮論》有“《清廟》之歌，一唱而三歎也”之評。《禮記·樂記》亦有“《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嘆”，但何謂“一唱三歎”？大多不甚了了。朱熹對“壹倡而三嘆”，解釋爲“倡，發歌句也。三嘆，三人從嘆之耳。”（《詩集傳》）但是李瀛則聯繫上篇的“於穆清廟”，下篇《維天之命》的“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有了獨到的發現：

竊謂《周頌》首三篇，皆祀文王之詩，孰非清廟之樂歌？必是同時奏者也。於歎辭曰“於穆清廟”，曰“於穆不已”，曰“於乎不顯”。同時歌之則“一唱”也，三稱歎辭則“三歎”。¹⁴⁾

12) 《詩經疾書校註》，頁99。

13) 參照於姚小鷗，《詩經三頌與先秦禮樂文化》，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中夏傳才的《序文一》，頁1。

14) 《詩經疾書校註》，頁467-468。

如此，讀者也恍然大悟了。又如〈周頌·維天之命〉，後人大多依朱憲注“此亦祭文王之詩”(《詩集傳》)，未作深究。李瀛卻有感而發，作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評述：

何處見得天命之不已？天一日一周，健而無息。若果有息，地爲之陷，日月爲之墜，萬物無生成之功矣。人物之自生至死，莫非從不息中賦來。天既如此，命獨有息乎？比如藤蔓延過許多，一斷其根，枝葉便瘁。天之命物者然矣。¹⁵⁾

這裏，對中國古代“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周易》)的哲理，作了深刻·精辟的闡述，又表明李瀛研究經典不落空疎·迂腐的俗套，他的目的在於實用於現實社會，從詩句的表面字義，進一步引申出“經世致用”的價值，即所謂的“讀詩正法”。李瀛對“頌詩”中作品的系年·名物典故禮樂制度的考釋，亦有許多可取之處，茲不一一贅述。

4. 博創致用，妙契清儒

《詩經疾書》的治學和釋詩方法，與清人有不謀而合，異曲同工之妙。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中說，清學就是根據確實的典籍解釋經典之學，並從顧炎武的《日知錄》中，梁啓超總結出建設新研究之法有三：貴創·博證·致用¹⁶⁾。李瀛研究與解釋經典亦然。若看《詩經疾書》，可以得知其治學方法之梗概。雖然沒有明確記載李瀛受到顧炎武之影響。但從當時清和朝鮮之間的來往，不難可而得知，朝鮮學者自然接受清學貴創·博證·致用的思潮¹⁷⁾。在此可以值得提出一件例證，李瀛的治經的見解和方法，結合文字訓詁學·校

15) 《詩經疾書校註》，頁468。

16)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11-12。

17) 尹大植，〈Political Implications on Chinese Practical Science in behalf of Il-Chi-Rok and Shift into Chosun〉(《東洋學》，2004年)一文中，也提起當時清和朝鮮的交流當中，朝鮮學者直接間接地受到中國學者之實學態度的影響。

勘學和版本學，很類似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而李灝之作早于馬瑞辰¹⁸⁾。若看《毛詩傳箋通釋》分析《邶風·靜女》的一段：

‘靜女其姝’《傳》：“靜，貞靜也。姝，色美也。”瑞辰按：《說文》‘姝，亭安也。’凡經傳靜字皆姝之假借，若靜之本義，《說文》自訓寤耳。靜·姝又與靖通用。文十二年《公羊傳》‘惟譏善善言’，王逸《楚詞注》作‘靖言’。《廣雅》‘姝，善也。’《藝文類聚》引《韓詩》‘有靜家室。’靜，善也。鄭詩‘莫不靜好’《大雅》‘籩豆靜嘉’，皆以靜為靖之假借。此詩‘靜女’亦當讀靖，謂善女，猶云淑女·碩女也。故‘其姝’·‘其變’皆狀其美好之貌。《方言》‘齊魏燕代之間謂好曰姝。’《韓詩外傳》‘居處齊則色姝。’是姝為有德之色。《說文》‘姝，好佳也。’引《詩》‘靜女其姝’。裴字注：“一曰，若‘靜女其姝’之姝。”又：“女受，好也。”引《詩》“靜女其女受”。蓋本《三家詩》。姝則姝之同音假借也。《一切經音義》卷六云：“姝，古文女受，同。”¹⁹⁾

其體例，不是簡單註解全書的詩句，而是首先舉出要說明的詩句後，直接申說自己的異論及解釋。其對本文的文字和關聯的人·事·物進行詳細的證明，其體例和解釋方法頗類似於《詩經疾書》。如《魯頌·閟宮》云：

大房，恐是俎之有欄者。《註》云，常，守也。《疏》云：言其常守魯國，故以常為守也。愚謂常當帖上保字說，謂常守也。其語意，如斯言之玷。“不可為”，為帖上磨字說，謂不可為磨也。禮所謂不身踐也，踐帖上殺字說，謂不可踐殺也。古人下語多如此。《說文》軛，特也。駢軛，赤特也。……²⁰⁾

兩者之間，同樣具有廣證博引·細分縷析的特色，雖然有時空的不同，但其治經的體例和方法，却有着不謀而合·異曲同工之妙，亦可看出李灝的開創性和先進性，既採納·吸取漢學，又影響·啟發漢學。

18) 金啓華言及李灝《詩經疾書》和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的類似點。見於《詩經疾書校註·序》，頁2。

19) 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156-157。

20) 《詩經疾書校註》，頁516。

5. 比較研究, 別開一境

《詩經疾書》學術價值的另一重要方面, 是對後代文學影響論和比較論的重視和探討。李灝博學多才, 漢學功底深厚, 對《詩經》及其後的漢魏六朝文學·唐宋文學都非常熟悉, 所以在評述《詩經》時不是就事論事, 就作品談作品, 而能常常把《詩經》與後代詩文聯繫起來, 在研究中別開一種境界。例如, 對《小雅·魚麗》, 朱熹注云: “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即燕饗所薦之羞, 而極道其美且多, 見主人禮意之勤, 以優賓也。”(《詩集傳》) 泛泛而談, 無甚新意, 而李灝的《疾書》卻是:

旨, 美味也, 多則非一物也。有者, 豐也。《禮》云: 醴醢在戶, 棗醢在堂, 澄酒在下。亦多之義也。借, 據上三章, 乃魚與酒借有也。蘇氏得之爲《赤壁賦》, 其所謂有客無酒, 有酒無肴及携酒與魚者, 一出於此。²¹⁾

把《詩經》與千年之後的蘇軾名篇《後赤壁賦》聯繫起來, 真是奇思妙想, 絕無僅有的。而這種聯想又非無根之談, 試比較兩篇作品:

魚麗于罟, 鱔鯨。君子有酒, 旨且多。魚麗于罟, 魴鱧。君子有酒, 多且旨。魚麗于罟, 鰕鯉。君子有酒, 旨且有。物其多矣, 維其嘉矣。物其旨矣, 維其借矣。物其有矣, 維其時矣。(《小雅·魚麗》)

已而歎曰: “有客無酒, 有酒無肴, 月白風清, 如此良夜何!” 客曰: “今者薄暮, 舉網得魚, 巨口細鱗, 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 歸而謀諸婦, 婦曰: “我有斗酒, 藏之久矣, 以待子不時之需。” 于是携酒與魚, 復遊于赤壁之下。(蘇軾《後赤壁賦》)

同是舉網得魚, 同是魚肥味美, 同是家藏美酒, 同是歡宴待客, 兩者極爲相似。在李灝的另外著作《星湖僿說》中, 有更詳細的對照和比較, 解說云:

21) 《詩經疾書校註》, 頁265。

蘇子瞻<赤壁賦>云：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携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此專出於<小雅·魚麗>‘鉅口細鱗’與‘鱸鯉’相照，‘我有斗酒’與‘君子有酒’相照，‘狀如松江之鱸’，與‘維其嘉矣’相照，‘携酒與魚’，與‘維其偕矣’相照，‘不時之需’，與‘維其時矣’相照。且既云旨云多，又云有，有者即藏久之意。凡酒待久而成者，必味烈。此<周禮>三酒之類，鄭氏所謂曾久舊醖是也。云有即烈在中。<周禮>先言五齊後言三酒，齊者易成味甘。凡禮先醴而後酒，旨者甘也。所以先旨而後有也。然則‘斗酒藏久’，亦與此相照，東坡可謂善看文字矣，善演詩意矣。²²⁾

李漢評蘇軾<後赤壁賦>謂“善看文字，善演詩意”，終究其根源歸於<詩經>的。又如<小雅·蓼莪>的<疾書>云：

山則烈烈·律律，風則發發·弗弗，常人而見之，原非淒傷之境也。惟哀怨者遇之，莫非觸目增懷，以助我悲思。杜詩云：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凡興體概多此類。²³⁾

此處不但聯想到唐代杜甫的名篇<春望>，還論及了詩人的藝術感受·藝術敏感和創造，即文藝心理學的課題。此外，李漢還從<魏風·葛屨>中的“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維是褊心，是以爲刺。”五句之意，影響到杜甫<哀王孫>的“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²⁴⁾李漢又由<大雅·蕩>中的“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四句詩聯想到，杜甫的一篇<枏樹爲風雨所拔歎>，云：“杜甫得之爲<枏木歎>，發揮亦好。”²⁵⁾李漢由在<星湖僊說>中再評曰：“杜子美得之爲枏樹一篇，其寓意深矣。”然後，接着

22) 李漢，<星湖僊說>第29卷。見於<星湖全書>六，頁1082。

23) <詩經疾書校註>頁328。

24) <詩經疾書校註>頁161。

25) <詩經疾書校註>頁435。杜甫，<枏樹爲風雨所拔歎>：幹排雷雨猶力爭，根斷泉源豈天意。

解說〈大雅·桑柔〉與唐宋韓愈和邵雍之作的關係，云：

桑柔云：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言君子小人，行處異路也。韓退之得之云：萬物都陽明，幽暗鬼所竄。邵堯夫發揮之云：幽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鳳。此皆詩家奪胎法。三百篇之為大源，豈不信然。²⁶⁾

韓愈的〈題炭谷湫祠堂〉，邵雍的〈蒼蒼吟寄答曹州李審言龍圖〉之根源應歸屬到《詩經》。凡此種種，具有獨到的文學發現和美學的感受，都是古今治詩者所鮮見的，可以發人深長思之。

6. 謙虛好學，不恥下問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李瀾撰《詩經疾書》謙虛好學·不恥下問·博采眾長的君子風度和情懷。他在《星湖僊說》中曾說：

君子盡心殫力，誠求博訪，冀得其本旨，集眾說而揀別之。雖譚言妄談，莫不詳審，苟使乖舛倍理容焉。而不罪此不恥下問之所以為文也。如仁主御極求治之功，劇於飢渴，下詔求言，論議逕至，惟賞其善，而不罰其不善也。又如病身得醫，苟有術必就而詰之，不憚遠近，冀或有裨。又如行子問路，日暮途遠，岐岐皆疑，刈草取柴，愚蟲婦孺，一一採訪，其或給或錯皆不計，所謂詢于芻蕘是也。先儒之於講貫，其意如此，所以能得七分八分之域，尚不無二三可疑難曉處在，而留待後之知者也。此則意與天地同公，事與聖人同恢，建立一箇大門法，與百世共其心也。今之學者不然，設為禁網刀鋸以待人。尺寸之外，開吻不得，昆侖吞棗，依樣畫葫，強說臆對以為高致。其於帖骨帖肉處，却未必有得，是以標榜為儒者，其眾如牛毛，其得如麟角噫。²⁷⁾

這種“不恥下問”“集眾說而揀別之”的態度，在他的《詩經疾書》中鮮明地

26) 《星湖僊說》第28卷。見於《星湖全書》六，頁1064。

27) 《星湖僊說》第21卷。見於《星湖全書》六，頁767。

表現出來的。首先察看李灝接受姪子李秉休的見解之處，如〈國風〉冒頭中引用之：“秉休云，豳爲周公之采地，見於孔穎達《正義》。”²⁸⁾又如〈豳風〉中：“秉休云，孔穎達《正義》云邠是周公采地，當考。”²⁹⁾姪子李秉休曾經師從李灝，舉學生之見解來考證而不諱。其次，李灝除了姪子外，還採取亡子李孟休和孫子李九煥的見解，“惟賞其善”而收錄之。先舉亡子李孟休之見，如〈周頌·烈文〉中：

亡子孟休云，錫茲祉福，非助祭者之事。《盤庚》云，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辟公者，周公召公之類是也，非《離》詩之辟公。此說有理。雖有助祭之三恪，豈宜以此起端？而“烈”之稱，又甚不侔。更詳之。”³⁰⁾

又如〈商頌·殷武〉中：

亡子孟休云，禹啓後，三宗迭興，德化之浹人深矣。桀雖失德，世家舊臣亦豈無顧戀先后之志？故天下截然歸商，而韋·顧·昆吾，獨不肯遂。先桀受兵，此必有由然。豈黨桀而已？殷之革夏，周之革殷，其揆一也。先儒考諸《大誥》·《洛誥》等篇，以徐·奄·淮夷爲殷忠臣，此微顯闡幽之義。而獨其三侯聲迹俱泯，僅一見於此。故秉筆者，不及焉。余故曰韋·顧·昆吾夏之忠臣，而殷之頑民也。此說亦有理，故錄之於後。”³¹⁾

李灝又採錄孫子之見解，見〈小雅·白駒〉中“微子三恪也，與於廟事。此特朝見而已。小孫九煥有是說採之。”³²⁾又如〈小雅·正月〉“小孫九煥云，與《巧言》章‘蛇蛇碩言，出自口矣’義同，亦有理。”³³⁾又如〈大雅·生民〉“小孫九煥云，孔穎達《禮疏》引王肅說，以敏歆爲句。”³⁴⁾凡此種種，無不體現了一

28) 《詩經疾書校註》，頁1。

29) 《詩經疾書校註》，頁233。

30) 《詩經疾書校註》，頁470。

31) 《詩經疾書校註》，頁528。

32) 《詩經疾書校註》，頁288。

33) 《詩經疾書校註》，頁303。

位大學者可貴的治學精神，即孔子所說的“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論語》)也使《詩經疾書》具有許多可貴的發現和成就。

IV. 結語

整理以上的探討，可以小結如下：

《諸經疾書》表現了朝鮮時代著名學者李瀾對儒家的基本經典所作的全新認識和全新解釋，而《詩經疾書》則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在當時西洋文明及清朝新學風的影響之下，此書擺脫了“尊毛”(《毛詩序》)·“崇朱”(《詩集傳》)的束縛，體現了反對空談性理·注重經世致用的特色。書中引用古書多達五十餘種，多為明清之前傳入韓國的中文典籍，包括一些極為珍貴的古代版本資料，對整理·校刊相關的古籍具有較高的文獻和學術價值。同時，在《詩經》研究領域，《詩經疾書》也有重要意義。李瀾遠紹漢學，中承唐宋，近師清儒，對朱熹的《詩集傳》並不盲從，而是博采諸家之長，在細緻的研究之後，提出自己的獨特見解，如他對於《詩經》“六義”的探討·對詩歌主題的闡述·對史事的考證·對“頌詩”的獻疑和探究，乃至於一字一句的訓釋，皆能自出機杼·新人耳目，而又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如此的治學和釋詩之法，與清朝馬瑞辰的《毛詩傳箋通釋》有不謀而合，異曲同工之妙。但撰書李瀾比馬瑞辰早。另一方面，文學和美學研究也是此書的重要價值之一。李瀾注重闡發《詩經》對於後代文學的影響，如他將杜詩·蘇文與《詩經》的藝術互相參證等，這也使得該書在《詩經》的研究史上別具一格，具有開創性的·突破性的發現，對後人頗多啓發。

總之，《詩經疾書》作為域外學者的一部著作，既吸收了漢儒·宋儒·清儒治經的種種長處，乃至不恥下問，又具有獨特的研究視角和方法，具有一定的學術文獻價值，在《詩經》研究史上也應當佔有一定的地位。

34) 《詩經疾書校註》，頁409。

<參考文獻>

- 《詩集傳》，臺11版；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2年。
- 《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金啓華主編，《詩經鑑賞辭典》，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0年。
- 周振甫譯注，《詩經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李岩，《朝鮮李朝實學派文學觀念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
- 白承錫校註，《詩經疾書校註》，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年。
- 姚小鷗，《詩經三頌與先秦禮樂文化》，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
- 《四庫全書》，子部，儒家類，《性理羣書句解》。
- 白承錫，〈李瀼及其詩經疾書〉，《第三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天馬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
- 李瀼，《星湖全書》，서울：驪江出版社，1984年。
- 歷史學會，《實學研究入門》，서울：一潮閣，1973年。
- 玄相允，《朝鮮儒學史》，서울：民衆書館，1974年。
- 韓祐勳，《星湖李瀼研究》，서울：서울大學校出版社，1980年。
- 金興圭，《朝鮮後期の詩經論과 詩意識》，서울：高大民族文化研究所，1982年。
- 崔錫起，《星湖李瀼의 學問精神과 詩經學》，大邱：중문，1994年。
- 崔錫起譯註，《星湖詩經疾書》，서울：臥牛出版社，1996年。
- 尹大植，〈Political Implications on Chinese Practical Science in behalf of Il-Chi-Rok and Shift into Chosun〉，《東洋學》第36輯，2004年。

<國文提要>

朝鮮朝 李瀾의 《諸經疾書》중 하나인 《詩經疾書》는 《毛詩序》와 《詩集傳》의 속박에서 벗어나 새로운 해석을 시도한 《詩經》주석서로, 당시 서양문명과 淸朝의 새로운 학풍의 영향 하에 기존의 성리학과는 다르게 해석하여 저자의 經世致用的 특색을 나타내고 있다. 李瀾은 明·淸代에 중국으로부터 朝鮮에 전래된 많은 전적들을 근거로 하여, 朱熹의 주석을 맹종하지 않고, 여러 이론들을 취하여 세밀하게 연구한 뒤에 자신의 독특한 견해를 주장하였다. 예를 들면 《시경》의 “六義”와 “淫詩”에 대한 검토·史書에 대한 고증·“頌詩” 부분에 대한 의혹과 탐구 등에 관한 것이다. 이러한 이익의 견해는 근거가 있고 이치에 맞는 字句 해석을 통하여 드러나고 있는데, 《시경》연구에 또 다른 학술 문헌적인 가치를 가지고 있다 하겠다. 이밖에도 《시경질서》의 중요한 가치 중의 하나는 후대 중국문학에 미친 《시경》의 영향에 대하여 새로운 자신의 견해를 밝힌 점이다. 즉 이익은 杜甫와 蘇東坡의 시문을 《시경》과의 대비를 통하여 그 근원적 관계를 밝혔는데, 이 같은 결과는 지금까지 누구도 발견하지 못한 독특하고 선구적인 것으로 후대의 《시경》연구에 참고할 만한 가치가 자못 크다 하겠다.

요컨대, 이익의 《시경질서》는 중국 이외 지역 학자의 저작으로, 중국 역대 《시경》연구의 장점을 흡수하고, 아랫사람들의 의견이라도 참고할 만 한 것은 받아들이는 등의 독특한 연구 시각과 방법을 통하여 새로운 견해를 제시하였는데, 이 같은 이익의 연구 성과는 전체 《시경》연구에 있어서 주목할 만한 것으로 그 학술 문헌적 가치를 살필 수 있겠다.

주제어 : 詩經, 李瀾, 詩經疾書, 詩集傳, 實學

